

禁欲时期的爱情

祝勇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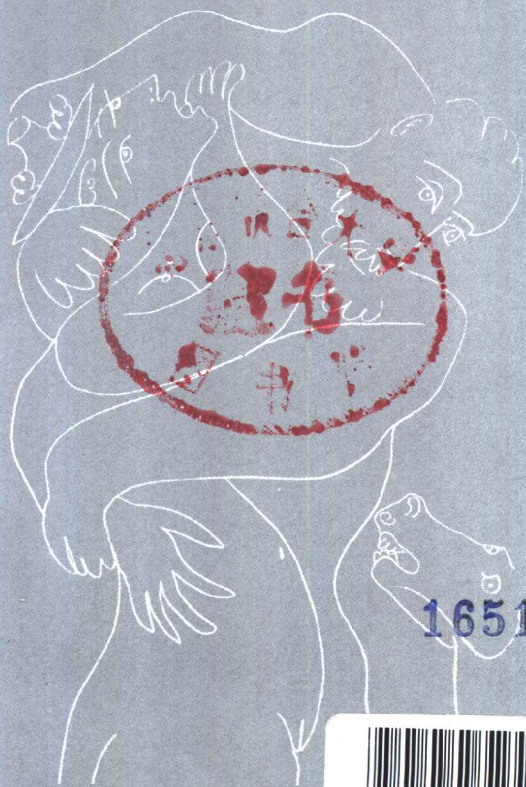
高莽 插图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行走的祝勇



禁欲时期的爱情



165123



北京联大

0007801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禁欲时期的爱情/祝勇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.
1999. 12 (行走的祝勇)

ISBN 7-5059-3453-8

I. 禁… II. 祝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 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3423 号

书 名	行走的祝勇(共三册)
作 者	祝 勇著 高 莽插图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戴 东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北京国防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370 千字
印 张	19.25
版 次	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7-5059-3453-8/I. 2632
全套定价	4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

· 自序 ·

我的三卷本作品集出版后，除了写一个散文系列（即《改写记忆》）之外，我不想再安排其他写作。这个系列本身的进展也十分缓慢，我把它当成一种休憩，丝毫不存在时间的紧迫性。其实，每次出书以后，我都告诫自己不要再写、不要再出书了，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读书，而不是写作。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行色匆匆的路人，该停下来观望一下风景，享受一下旅行的快乐了。但是多年的积习依旧难改，偶有所感，总要记录下来，待友人来约稿时，才发现读书和文化方面的札记，又摞了厚厚一叠。

任何一个严肃的写作者都有他内心的准绳，这是毋庸

1987/03

讳言的，我只是希望自己尽量以一种平易的姿态说出。同许多人一样，我寻找着真理的路，但我决不自视为一个英雄，我没有那么神圣的自我意识，也没有普渡众生的特异功能，只要能做一个正直的普通人，只要能在风雨凄怆的河流上摆渡自我的生命，就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。就像诗中说的：“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／我只想作一个人”（参见本书《诗人的乌托邦》一文）文化是一种启蒙，是即使付出整个生命也不一定看到收获的“长期投资”，生命的意义与精神的价值，也绝对与嗓门响亮与否无关。所以，那些盛气凌人、自命不凡的“思想者”，那些一面捧着少女的鲜花一面以优雅的姿态参与决斗的绅士，每每都令我作呕。最孤独和痛苦的人并不是他们（尽管他们中流行将这两个词挂在嘴边），而是那些连呻吟声都发不出来的众生。

我们都是凡间的人，有凡人的情感和思维，我们都不是天上的人，所谓的天使是不存在的。鲁迅是盗天火的人，但他也属于人间，故而我们每一个人在话语上都是平等的，也都应当自觉抵制话语霸权的出现，不论它们披着怎样的外衣。我曾编过一本书，名叫《声音的重量》，是我们六个年轻作者的合集（作家出版社印行），我试图以此表达我对公正的天平的渴求。

以上可以表达我写作的心态。至于具体篇目，写作时觉得很零散，编造一卷，发现还是有其内在的线索，反思了二十世纪一些文化现象，讨论了其中我所感兴趣的话题。二十世纪是一个太特殊的世纪，它的历史容量太大了。每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都为这个世纪付出了自己的代价，每一个内心丰富而敏感的文化人，视线都无法避开这百年时光。我也是一样。尽管这百年中只有三十年属

于我，但是这个世纪的话题却总是缠绕着我，挥之不去。初写这些文章时，固然没有一个总体构想，但笔端总是想触及岁月深处的敏感部分，既使写书评，也总是不自觉地进入历史的大视野中，而不局限于某些具体关节。我说过，这一年的写作以《改写记忆》为主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其实这两本书相辅相成，互为基础，互为补充。这些文字没有任何深奥之处，或许无法像别人的作品那样吸引众人的目光，但我在做我应该做和必须做的事。这种写作塑造了我的精神也润泽了我的心灵。我给生命找到了一条好的出路。不管别人怎么评说，我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说我自己的话。真正有价值的不是思考的结果，而是思考本身。我在这种写作中感到了思想的快感，我不是布道者，充其量只是一个躲在阁楼里破解谜面的数学爱好者。

便又出了一本书。在这方面，我又失言了。

一九九九年八月一日



行走的祝勇

改写记忆

禁欲时期的爱情

手心手背

ABB37/03

责任编辑：戴东
装帧设计：钟嵘

I267/266
索书号

索书号

书名: 行走之间

登录号:

借

者

借

分 类 编 号

登记号

1. 爱护公涂
折和赔偿
章请在借
2. 请他人阅

1^成6¹5⁶1¹23

作者简介:

高莽，一九二六年生。终生从事
俄苏文学的翻译、研究，出版随笔集、
长篇传记多种，美术作品被俄、德、日
等国纪念馆、图书馆收藏。一九九七年
被俄总统叶利钦授予友谊勋章。

祝勇，一九六八年生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已出版随笔集多种，有三卷本《祝勇作品集》行世。

目

录



苍凉的回眸	1
最后一滴英雄血	10
书斋与广场	14
重读大师	23
骨牌与人类命运	28
从昏迷中逃亡	32
存在的代价	39
——透过舒芜看“迷失”	
《红色娘子军》：对苦难的美化	74
禁欲时期的爱情	84
诗人的乌托邦	97
我读史铁生	111

为什么远行	114
与大地相同的心灵	129
——纪念苇岸	
思想随笔:绝境的地图	135
指纹:鉴别散文的一种方法	142
——张锐锋、钟鸣、于坚、庞培与新散文写作	
以笔为泉,以文润魂	157
——关于“新文人现象”与刘心武对话	
精神述说的一种可能	171
——“新文人”的话语意义	
把文化穿在身上	188
体验往昔	191
——品味“老照片”	
西藏的诱惑	196
热点之累	203
文化批评的游戏规则	207
躺着读书	213

苍凉的回眸

《老照片》（山东画报版）的风靡至少验证了一件事实：在这捉摸不定的世纪之末，怀旧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情绪。这种情绪可能是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：它可能与世纪末情结有关（实际上我们不仅处于世纪之交，而且



处于千纪之交），可能是部分知识分子历史使命感的产物，也可能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不满。所以，《老房子》、《老古董》（均为江苏美术版）、《老漫画》（辽宁教育版）、《老月份牌》（上海画报版）等，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触摸已逝岁月的媒体。

于是，这种怀旧情绪就像流行病一样地传染开来，若说略有不同，也不过是具体的指向方位有异罢了：你留恋清末乱世里的浪漫与传奇，我关心市井生活的平坦与沧桑；你考察世纪初的边疆探险路，我追思三十年代的海上繁华梦，仅此而已。

这种对于走过岁月的深情眷恋，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感性的蔓延，或者说是一种情绪的渲泻。人们可以在打饱嗝的间隙里回味一下旧军装、旧粮票、旧布票，想念一下红宝书、红棉袄、红缨枪，也可以重温一下冰冷季节里的人际温暖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愿意重回昨天。人们记忆里的历史，与真实的历史，决不是一回事。

历史永远是客观存在的，如同一尊坚硬了千百年的雕塑。岁月的流水可以湮没记忆却冲不走历史。人们心头的历史是经过了“再创作”的历史，与真实的历史影像并不重叠。

回首并不是一件坏事，而伤感主义的泛滥和理性的缺席却可能将我们引向歧途。

这并非危言耸听。一个重大的危

险，来自于每个人都是站在对个人有利的视角上，而非历史的视角上看待曾经发生过的一切。这块土地上曾经充斥着暴行与血腥，奇怪的却是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是无辜者，而无人去承担其注定逃脱不了的历史责任。仿佛所有的灾难都是天灾，所有的不幸都是空穴来风。一旦危险过去，便人人都成了英雄。老“右派”们似乎忘记自己在软弱时扮演过犹太的角色，“老知青”总有满腹诉不尽的苦水而无暇顾及造反时打在别人脸上的响亮耳光，张承志更是明目张胆：“我毕竟为红卫兵——说到底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汇，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叛逆性质，坚决地进行赞扬”。

（《无援的思想·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》，华艺版）善良的逆世之音还是有的，像邵燕祥的《人生败笔》（河南人民出版社），但中国至今没有产生像苏俄的那样力透纸背的理性之作。一九四五年，经历了纳粹浩劫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发表《德国人的罪责问题》一文指出，除了负有法律上罪责的战犯以外，全民族中所有没有公开反对纳粹的人都不可能推卸地负有政治上、道德上和本体上三个层次的罪责。因为罪责是全民性的，对它的惩罚也是全民性的。这是清醒者的忏悔，也是对人类的忠告。而在经历了全民族的政治癫狂之后，除了“伤痕”与“谴责”，几乎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，好像每个人都是完美的天使。

苍凉的回眸

这样，我们的“回首”便为误读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文本。

学人的加入使得世纪末的怀旧主题注入了理性色彩。如果说泛滥的怀旧情绪是汪洋中的一条船，那么诸如李济琛等《戊戌百年祭》（华文版）、孙郁《百年苦梦》（群言版）、谢冕《世纪留言》、（广播电视版）、夏晓虹《旧年人物》（同上）、黄兴涛《文化怪杰辜鸿铭》（中华书局版）、伍立杨《鬼神泣壮烈——清末民初暗杀论》（陕师大版）、朱正《一九五七年的夏天：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》（河南人民版）等为代表的学人著作则试图为这条船找到方向。而王元化主编的《释中国》等，则试图对世纪思潮再做一次细致的梳理。

不论今天以怎样的目光打量过去，传统文化都有其合理性，起着一种文化制衡作用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割断。一切体制与文化，无论是在静态中还是在动态中，都可以达到某种平衡。超越世俗思想平均值的新思维，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，存在着一种动态平衡。其平衡值，可能是正值，也可能是负值。当辜鸿铭重新浮出历史的海面，很多人为其东方保守主义大呼其怪，其实这不过是历史的常态罢了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倘新文化处于优势，平衡值为正值，社会就处于平稳进步状态；反之，则处于逐渐倒退状态。如果说社会革

命是一种质变，那么这种质变必须建立在文化进步的充分量变的基础上，任何试图把传统的尾巴一刀切干净的社会革命，都是徒劳，只能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。

中国的历次革命（从“五四”新文化革命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），都是边“革命”，边“文化建设”，而且都是在匆忙中以强力来封堵传统文化，这样，过去的东西非但不会死亡，反而令其更有韧性来与时间拔河。就像爱伦堡在斯大林时代说过的：“你可以用沥青覆盖世界，但是总有几株青草能自隙缝中萌芽滋生。”历史遗留问题没有真正解决，总有一天还得重新正视它。经过的若干年的断裂之后，如今我们又重拾旧日话题，又不得不抛开业已形成的认知模式和既定观念，重新打量纷纭的过去，原因正在这里。

二十世纪是一个转型的世纪，处于两种大的文化板块的衔接带上，前一个板块是数千年的封建专制、极权主义的板块，后一个板块则是一个难以成形的理想主义的板块。两种板块不仅在二十世纪开始接触（姗姗来迟的接触），而且在二十世纪彼此冲撞，挤压，纠结，反弹。二十世纪的历史空间毕竟太狭小了，实难有更大的回旋余地，所以，混乱与无序，中断与重建，都是情理中事。就像黄永玉说的：

“有如军事训练中在饭堂吃饭一样，好大的一碗白饭下命令两分钟吃完！”（黄永玉怀旧文集《那些忧郁的碎屑》，三联

版)，即使稻谷里有营养，也吃得似是而非，消化不良。所以，这个世纪到处都充满了矛盾——人们一边唱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”，另一边却在唱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”；到处也都充满了反复——世纪之初的声音，到了世纪之末才听到回声，这些，都是再正常不过了。对于个体生命来说，一个世纪无比漫长，然而对于历史来说，一个世纪只是一眨眼的工夫。所以，个别重大问题的暂时中断，也不过是两次震颤当中的小小间歇而已。

辜鸿铭、汤用彤、马一浮、梅光迪、钱基博、顾颉刚、梁漱溟……如果说这些大师还没等历史听懂他们的声音便匆匆谢世，那么，在世纪末的阳光里重续其精神香火，未尝不是件有意义的事情。

二十世纪的一大特点，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匆匆忙忙，一种思潮还来不及总结，一种罪恶还来不及清算，兴奋点便早已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，故而很多事情，做了等于没做，颇有点熊瞎子掰玉米的遗风，有害的东西，只消稍稍变个花样，便可以继续为害，从容不迫，蔚为一大景观。

法西斯主义是二十世纪的癌症，中国和全世界一样，受纳粹之祸害可谓深矣。然而，自希特勒自杀以后，法西斯主义死亡了吗？没有。法西斯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忠实伴侣，它的幽灵不仅战后得以继续在世界范围内游荡，而且愈发有恃无恐。在

古拉格群岛，在博萨卡的宫廷，在被坦克履带碾碎了的布拉格之春，在波黑集中营，到处可见它的阴影。外国的事情且不去说，为反法西斯的理论与实践感到自豪的中国，又该如何解释“文革”中的武斗与屠戮，如何解释自己人在政治迫害中的犯下的血腥暴行呢？历史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，在步履仓促的二十世纪，任何反复都是可能的。蒋廷黻三十年代鼓吹“法西斯救国论”，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；而世纪之末，所谓“新左派”的诸多企图使“文革”理论与实践合理化的论调（如崔之元的《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》），倒使我们有些不寒而栗。如果以为历史已经成为过去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
苍凉的回眸

清理这个泥沙俱下，秩序混乱的世纪，是摆在世纪末知识分子和出版界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，任何形式的怀旧，都应当是这个母题之下的子题。扫除人类灵魂里的垃圾，和传承历史深处的瑰宝，是同样重要的。中国思想界，不能永远像中国足球那样白付学费。当然，每个人思想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二十世纪。从个人角度出发，可以得出大相径庭甚至全然相反的结论。有人从极端理想主义出发，有人从自由主义出发，有人从人道主义出发，有人从欧陆唯理主义出发，也有人从英美的经验理性出发……莫衷一是。人是会思想的芦苇，张承志至今坚守他的乌托邦理论